

从“主旋律”到“新主流”： 中国军事电影的类型演变与突破*

From “Mainstream” to “New Mainstream”: the Genre Evolution and Breakthrough of Chinese Military Film

文 赵博雅 /Text/Zhao Boya

提要：近年来，随着一系列现象级军事大片陆续上映并开辟票房和口碑的双赢局面，具备了明确商品意识和市场意识的军事电影开始走出“主旋律”的创作困境，以“新主流大片”的形式实现了类型的整合升级。本文从人物塑造、题材范畴、类型变迁和伦理价值嵌位四个方面对军事电影的类型策略、发展演变及意义指向进行系统论述，以期对军事电影类型创作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关参照。

关键词：军事电影 类型 “主旋律” 新主流 国家伦理

有别于好莱坞战争片以战争为主要内容的创作路径，中国军事电影作为以军人、军队和军事行动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泛电影类型，蕴含着更为丰富的意义内涵。它既包含了战争片的战场叙事，又囊括了战争之外的军事行动、军事科技、军队活动乃至军人生活等广泛的题材内容。作为中国电影史上最为重要的题材类型之一，军事电影密切关联着中国革命历程和新中国发展历程，体现出明显的现实主义美学风格和政治意识形态属性。

中国电影诞生之初，《定军山》便展露出军事电影的雏形。抗战时期，左翼电影运动、国防电影运动促成“文化电影战线的进步力量和武装斗争相配合”，⁽¹⁾造就了抗战电影、国防电影等军事电影的发轫。1949年后，抗战片、革命历史题材、革命英雄传奇等军事电影牢牢占据国内电影市场的主导地位，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如《地道战》《上甘岭》《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等。20世纪80年代始，军事题材电影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逐步走低。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沉寂期后，一批现象级军事大片陆续上映，如《集结号》《湄公河行动》《战狼》系列、《红海行动》等，它们不仅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也成为观众、学者乃至产业所关注的焦点。其中，《战狼2》更是以56.8亿元的票房成绩创下中国影坛的最高纪录，充分显示出军事电影巨大的市场潜力。

一直以来，中国军事电影所携带的“政治”“意识形态”基因，使其成为“主旋律”话语表述的重要载体。“主旋律”虽然是80年代末提出的一个基本概念，但从1949年以来，有关“红色经典”“革命题材”“工农兵电影”等不同历史时期的相关表述，实际上已经含有了同“主旋律”如出一辙的意识形态话语的语义内涵。

随着电影产业化改革和工业化生产的不断推进，具备了商品意识和市场意识的中国军事电影已经不能再简单地以“主旋律”意识形态话语所统领，而是有了契合

时代需要的新命名——“新主流”，它不仅在语义逻辑上具备主流价值、主流意识等“主旋律”既有属性，更囊括了受众认同、大众审美、市场认同等符合现代电影观念的文化内涵和产业属性，这也使得“原先的比较狭窄的主旋律电影容纳了商业性的因素，向市场靠拢，回归大众文化，价值观上比较开放也比较普世性的一种结果”。⁽²⁾由此，作为“新主流”的当代中国军事电影开始呈现出明显的类型化、商业化、多元融合的时代特质。

一、彰显时代精神的英雄人物塑造

“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³⁾早在60年代，学界就对“是否需要英雄”以及“塑造什么类型的英雄——造神与造人”展开了激烈争论。搁置争论结果，英雄始终是文艺作品聚焦的重点。对于具有“英雄”母题的军事电影而言，英雄人物的塑造更是其创作的核心。不少学者将军事题材电影统称为英模电影、英雄片，足见其重要性。

我们的革命战争电影曾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具有崇高革命理想和高尚道德情操的英雄形象，如连长张忠发、游击队长李向阳、志愿军战士王成等。这些英雄形象鼓舞了一代人的革命斗志并建构起一个时代的审美倾向和价值取向。然而，在政治挂帅的特定历史时期，英雄人物的塑造限制诸多，要求“表现革命英雄共性的革命品质，……最本质的阶级性色彩”，⁽⁴⁾这种基于共性的创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跨文化语境下中国电影的民族想象与认同”[项目编号：16CC153]的阶段性成果。

(1) 章柏青、贾磊磊：《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页。

(2) 张卫、陈旭光、赵卫防、梁振华、皇甫宣川：《界定·流变·策略——关于新主流大片的研讨（上篇）》，《当代电影》2017年第1期。

(3)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

(4) 边国立：《中国军事电影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

作范式使得英雄形象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同质化的倾向而忽略了人性的多层次和复杂性,最终与观众渐行渐远。

改革开放以后,军事题材影视剧打破英雄禁忌,给英雄祛魅、脱冕,塑造出一批真实、有个性、有缺陷的平民英雄和另类英雄,这些英雄以近人伦的平民面貌拉近了与受众的距离。然而,过于展现英雄平民化、世俗化的一面,甚至戏谑英雄品质,消解了其应有的“英雄性”而落于平庸和空乏。在保守化的创作理念下,军事电影“遗落了不该丢失的东西,滑向一种失重失魂状态”。⁽⁵⁾

观照历史与现实,对英雄人物的“人性”和“英雄性”进行充分思考后,当代中国军事电影似乎完成了一种创作上的心理突破,在塑造契合时代精神的英雄形象上呈现出两个层面的变化:英雄动机和英雄特质。

在以往的革命战争电影中,激发英雄斗志、促其顽强抗争的动因除却主人公坚定的革命信仰,还基于报仇意志和阶级斗争意识,也正是“报阶级仇,雪民族恨”的使命必然,英雄甘愿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当下的和平发展年代,英雄人物的行为动机起于因果定律以及内化于心的军人职业精神。在电影《红海行动》中,蛟龙突击队队员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无论是队长面对各种突发情况的沉着应对和冷静部署,还是通讯兵临阵前仍不忘履行职责,皆体现出新时代军人尽忠职守、不辱使命、专业有素、勇于担当的职业伦理和职业精神。

不同于革命战争电影中主人公抱着坚定的信念、以简陋的装备战胜强敌并最终牺牲的悲情模式,当代中国军事电影的英雄人物契合了新时代精神,带有鼓舞人心、张扬大国气象的时代风采,主要体现为英雄精英化过程中过硬的专业技能以及强者的绝对实力。无论是战狼队员冷锋、霸天狼飞行员吴迪、蛟龙突击队队长杨锐,都具有典型的精英主义特质:有理性、有实力、有担当、有血性。这些智勇双全、实力超群的英雄形象展现出具有强国自信的新时代中国形象。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军事电影实现了从道德高尚的“崇高性”英雄到才能出众的“杰出性”英雄的重要转变。

当然,无论是英雄动机的变化还是英雄特质的变化,皆反映出时代进步和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的观念的变化尤其是英雄观的变化。随着社会分工的日趋专业、精细,英雄的固有属性不再局限于崇高的道德和完美的人格,而是更多地体现为专业硬实力与道德软实力的结合。这种英雄观的转变把握住了时代的精髓,兼顾了时代审美的变化,完成了彰显新时代精神的英雄书写。

二、从“三大战役”到“跨境行动”的题材拓展

一直以来,中国军事电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汲取了充分的灵感和养分,造就了其“十七年”

的黄金期。在这段时期,军事电影可谓一枝独秀,甚至到了“文革”时期更成为独放的一花。究其原因,除了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对于刚刚经历过解放战争的解放军战士和老百姓而言,“三大战役”是最能引发“群体共识性”的“标志性事件”,⁽⁶⁾能够有效唤起观众对于革命岁月的集体记忆和情感呼应,并从不同角度对革命战争进行历史性的备注。

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对传统的消解、对史诗的嘲弄、对经典的调侃使得“新时期”的观众对于严肃的、谨慎的、意识形态化的“主旋律”电影产生了一定的排斥。消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蔓延使得出生于和平年代的人们并不执著于历史,而是更关注当下和现实。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作为“新主流”重要成果的军事电影开启了新时代的大门,以双重维度视角完成了军事电影的题材拓展。无论是横向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统领军事题材的时空脉络,还是纵向上以人性的视点开掘军事题材的厚重之处,当代中国军事电影都以更宽的视野、更深的思考重现在大银幕上。

首先,表现在题材的不断拓展与跨越上。伴随着电影产业化的逐步深化,彰显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电影产业不仅需要以高品质的主流大片占领国内市场,还要能够走出去。这便需要中国电影站在更高的价值立意上,选取兼具时代感和普适性的题材内容。对于军事电影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意架构为其提供了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⁷⁾领域成为当代军事电影创作聚焦的重点,如电影《湄公河行动》《空天猎》《战狼》系列、《红海行动》等影片以禁毒、维和、反恐、撤侨等跨境军事行动为主要内容,其中也涉及难民和重大传染疾病等相关问题。这些领域涉及面广、直面当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成为“三大战役”的有力补充。至此,中国军事电影的空间格局开始向世界范围拓展。

其次,表现在题材的深度开发与挖掘上。福柯曾说,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电影作为社会现实的表征形式,讲述者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直接影响到故事的表述以及以何种视点表述。电影《集结号》虽然仍以“三大战役”(淮海战役)作为故事发生的时空背景,但电影并不执著于表现残酷的战争现场,在战争之外,影片的核心价值立意才真正得以开启。影片通过连长谷子地对集结号是否吹响的不断追问,引发观众对于战争、人性以及英雄主义的深刻思考。可以说,影片人性化的视点观照以及对主人公情感心理、行

⁽⁵⁾ 李洋《回顾与梳理——新时期军事题材电影漫谈》,《文艺研究》1989年第5期。

⁽⁶⁾ 孙承健《代际关系与作为标志性事件的电影》,《电影艺术》2016年第4期。

⁽⁷⁾ 习近平总书记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2017年1月18日,日内瓦)。

为动机的完整刻画有效地提升了电影的艺术品质和思想内涵。与此同时,这种基于人性的视点预设也可以看作是对“三大战役”题材内容的深度挖掘和价值探索。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三大战役”还是“跨境行动”,中国军事电影所聚焦的时空线索始终是向后关联的,是对历史与现实的观照,缺乏对于未来的想象。正如拿破仑所说,想象力统治世界。对于军事电影而言,题材的探索还应努力向前看,以大胆的创新精神探索未知的领域,在未来的无限可能中开掘出题材内容的新意来,为军事电影题材的进一步拓展提供大有可为的空间。

三、从单一叙述到类型融合与升级

作为一个广义的概念范畴,军事电影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开放性和延展性。它不仅能够轻松混合战争、史诗、动作、冒险、侦破、悬疑、警匪、神话等多种类型特征和类型变体,并且在经历了电影市场化转型后,其类型题材的不断拓展、类型融合的不断深化、类型元素的广泛运用和深度开发,皆使其具备了引领市场的巨大潜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电影不是作为商品生产,而是出于政治指令性的计划安排,因此,这一时期的军事“类型”的概念与商业类型片的现代概念尚有很大差距。正如“古典类型片对其他创作者是可仿效的他类型,‘17年’军事类型电影则是模糊状态的自类型”,⁽⁸⁾这一“自类型”是老一辈电影创作者根据戏剧“三一律”“三幕式”等结构原则,结合多年创作实践和美学思考总结出来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独特的美学风格,最终形成一种特有的“类”的范式。

改革开放后,以市场为导向的电影创作打破了电影政治社会化的绝对功能,军事电影的类型意识逐步确立起来。传统军事电影的形式要素和叙述策略也因地制宜地发生变化、演进和革新。与此同时,军事电影“不再有严格的具体阶段性的划分,不再有比较一致的美学形态,不再有相对单一的社会功能”,⁽⁹⁾而是逐渐形成具有现代意识的类型范式和叙述体系,军事电影的类型创作也开始呈现出多措并举、多策并用的发展态势。

首先,类型融合体现出军事电影巨大的包容性。类型融合作为类型发展进化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体现出军事电影的类型创作在应对产业变化时的策略性调整。整合多种类型特征和类型元素能够进一步激活类型文本内在的叙事张力,满足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纵使“2010年之前,符合标准类型片程式的类型电影还未成为中国商业电影的主流……适合类型片发展的产业生态环境和市场空间也确实尚未形成”,⁽¹⁰⁾然而,中国军事题材电影的类型化融合却已发生。如《三毛从军记》《绝处逢生》等以军事加喜剧的融合形式和游戏化的叙事策略打破了类型常规,通过荒诞、反讽、戏谑的喜剧手法化解了沉

重的历史叙述和惨烈的生命抗争,将以往的严肃题材转化为各种偶然性造就的笑料,在“各种不和谐的冲撞和调和”⁽¹¹⁾的喜剧效果中提升了军事题材类型的娱乐性;《建军大业》将军事、历史、商业有效融合,以“明星扎堆”的宣传效应和刘伟强的名导实力有效缝合了意识形态话语与商业价值的间隙;《集结号》《湄公河行动》《战狼》系列等影片更是融合了极具市场号召力的商业类型特征,如战争、历史、动作、犯罪、侦破、冒险等。其中,战争、历史等类型成分本身就蕴含着大背景、大场面、大时间跨度、复杂的人物线索等“大片”样态;而动作类型成分则具备了强大的视听冲击力和戏剧张力;悬疑、犯罪、侦查、冒险等又集中了最能调动观众参与意识和探究心理的类型元素……这些电影以多类型复合、叠加的杂糅形式进一步拓展了军事电影的受众群体并开启了中国军事大片的崭新时代。

其次,商业类型元素的有效运用强化了军事电影的娱乐性。作为商业化操作的结果,类型必然会携带一系列经过市场检验并认可的商业配方。在当代军事电影中,这些商业配方或类型元素往往以极具观赏性、震撼性和强刺激的形式原则和关涉生死的极端戏剧情境调动观众的情绪体验。《湄公河行动》《战狼》系列、《空天猎》《红海行动》等电影可谓是娴熟地运用这些商业类型元素,比如,飙车追逐、枪火交锋、特技爆破、海陆空多栖作战、特技飞行表演、高难度动作场景等。此外,军事电影在视觉景观、奇观美学上的探索也从未止步。《集结号》中以数字技术和特效爆破造就出令人震撼的战争“实景”,《战狼2》中惊心动魄的水下打斗、近身肉搏的场景让观众肾上腺素直线飙升,《红海行动》在中国海军的鼎力支持下,更是升级到直升机、坦克以及14亿元的北海舰队驱逐舰。作为一种明显有别于现实生活和日常经验的特殊存在,这些奇观化的影像呈现在满足观众视觉快感的同时,也以高品质的视听体验,成为满足观众消费文化心理的重要类型资源。

再次,经典类型的整合升级展现出军事电影的创新延展。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表述,当国家发展理念从大国精神的弘扬扩大到强国意识的话语建构,具有“强者意识”的“动作”类型元素开始融入军事电影的类型创作,由此,军事/动作/战争的亚类型迅速成熟起来,并逐渐成为军事电影的类型主流。从90年代的《烈火金刚》《飞虎队》《特别攻击队》等电影“融革命历史题材与打斗、枪战等动作片特点于一体”,⁽¹²⁾到具有转折

(8) 边国立《关于军事电影类型走向的思考》,《电影艺术》2005年第5期。

(9)(12) 同(2),第274、284页。

(10) 陈旭光、石小溪《中国当下类型电影的审视:格局与生态、美学与文化》,《民族艺术研究》2017年第1期。

(11) 程式如《愉快的震惊——三毛从军记的幽默》,《电影艺术》1994年第2期。

意义的《冲出亚马逊》以明确的类型策略和强动作元素实现“主流意识与大众文化的对话和共谋”，⁽¹³⁾直至今天，《战狼》系列、《红海行动》等以精良的制作、娴熟的视听手法、类型化的明星策略和军方专业的技术支持，全面提升了电影的品质，并以“新主流大片”的面貌和极具真实性和感染力的影像内容实现了军事/动作/战争类型创作的整合升级。

成功的“类型”运作能够促使“系列”的产生，一些军事电影从创作之初就具备了“系列”意识，如吴京导演的《战狼》系列、林超贤导演的“行动”系列（《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都采取了系列电影的创作模式和营销策略，不仅为军事类型的可持续发展和整合营销确定了方向，而且确立了军事类型片的品牌意识，如吴京、张涵予、林超贤等逐渐成为了当代军事电影重要的演员品牌、导演品牌和人物商标，而“战狼”系列、“行动”系列也成功地打造出中国军事电影的自有品牌。

四、从革命道德到国家伦理的价值转向

由于政治规约及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依托“主旋律”话语表述的军事电影有着一套较为稳定的价值体系。这套价值体系作为贯穿电影的“灵魂”以及叙事文本的道德前提可谓由来已久，本文将其归为革命道德。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所形成的道德规范体系”⁽¹⁴⁾，革命道德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国主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为主要内容”。⁽¹⁵⁾随着时代的发展，革命道德因其阶级伦理意识的局限性而逐渐从主流话语体系中退位。在“中国梦”理念内核的统领下，基于共同价值的国家伦理重新构建了新时代军事电影的价值坐标系。

（一）个体价值与集体利益的精神弥合

在革命战争年代，集体主义既是我国革命道德中的重要原则，也是我国社会生活中奉行的普遍准则。军事电影的主人公往往坚守着革命道德，将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一心为公，没有私心。这种道德原则境界极高，却有时代的局限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特定时代话语下对集体主义的一种误读。

随着现代社会主体意识的回归与个人价值的凸显，军事电影开始逐渐将关注的视点转向战争的主体——人。需要指出的是，对个体的关注并非以消解集体价值为代价而走向价值的另一端，而是以辩证客观的视点完善集体主义的价值内涵。《红海行动》在展现“蛟龙突击队”专业默契的集体配合所发挥出的惊人战斗力时，并未忽略对个体差异的展现以及人性深度的挖掘，这些个体形象不再是模糊的士兵甲、士兵乙，而是被赋予了明确的性格特质、角色功能和情节线索。他们相互对比，互为映照，人物及人物关系相互交织，极大地丰富了电

影的叙事内容和叙事视角。电影《空天猎》中，对个体英雄的塑造也并未脱离集体主义价值原则，王牌飞行员吴迪出于个人化动机——“成为独一无二的飞行员”而加入霸天狼特战队，在行动的关键时刻，教官的舍身成全使他顿悟，在集体主义的精神引领下，他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也在极限挑战中成就了个人理想、实现了自我价值。当代军事电影中的英雄不再是以惨烈的自我牺牲来成就集体利益，而是主动彰显“强者无敌、勇者无惧”的血性和魄力。当国家、集体不惜代价捍卫个体利益和生命权利的同时，英雄也在具体的行动中履行了军人职责，实现了自我价值，完成了双重使命。在人本主义的价值前提下，个人、集体、国家最终在价值共享层面找到了平衡点。

（二）基于国家伦理的三重价值陈述

作为具有重要意义的类型样态，军事电影既是国家形象的重要表征，也是建构崭新国家形象的重要助力。电影中，“国家”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化为一种伦理实体，表现为国家不惜代价拯救公民的军事行动、战士在跨境行动中所展现出的正义形象，以及国家应对复杂国际问题时的担当。这些影像化的叙述以及国家这一“角色”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所演绎的价值规范，都从侧面反映出一个国家的伦理取向。作为国家实体所具备的道德性，国家伦理以共同价值为道德前提，整合了革命道德中具有现实性、当下性、共享性的部分内容，同时在动态发展的维度积极关联全球伦理的重要内涵。基于此，作为树立国家形象，建构国家意志强有力的文化宣传产品，新时代的军事电影正逐步完成国家伦理的价值嵌位。

首先，体现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道德核心原则的继承统一。当代军事电影所彰显的国家伦理不仅囊括了革命道德中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完善化的集体主义）的基本内涵，并且延续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革命战争年代，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推翻三座大山、为解放事业奉献终身，皆体现出“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如今，“为人民服务”、保护公民更是构成了电影中军事行动的主要动机，并以特种兵战士肩负国家使命、拯救同胞、匡扶正义、关怀生命等具体形式得以展现。

其次，体现为“共同价值”基本内涵的切实体现。在文化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的意图表达层面，当下的军事电影在展示强大军事实力的同时，意在“生产”一种基于国家精神的文化感召力。这种感召力的形成，是以尊

⁽¹³⁾ 谭晓明《突破与坚守——近年来几部军事题材电影的文化分析》，《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¹⁴⁾ ⁽¹⁵⁾ 朱金瑞《试论中国革命道德的基本特征》，《高校理论战线》1999年第6期。

重个体生命的“共同价值”为前提的文本价值预设。无论是《湄公河行动》中，中国政府为遇害的13名中国船员恢复名誉、讨回公道，还是电影《战狼》《红海行动》中，国家第一时间组织力量解救患难侨民，甚至不惜动用国家机器，都表现出国家对于个体生命的尊重和爱护。作为国家伦理的价值前提，这种基于和平、正义、自由、仁爱的“共同价值”和伦理态度削弱了国家机器政治范畴的刚性，赋予国家实体以伦理的“人”性，从而激发民众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心理，并以共识性的价值理念引发受众广泛的认同。

再次，体现为全球伦理的积极倡导与主动践行。在全球问题日益严峻的时代，生态环境的恶化、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存在、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侵蚀人类肉体 and 灵魂的毒品交易及精神危机，都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才能遏制并逐步解决。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一直主动践行具有普适意义的全球伦理，并在国家伦理中积极呼应其价值准则。当代中国军事电影均体现出中国国家政府对主权国家的尊重，严格遵照国际秩序和法则行事。无论是《湄公河行动》中，中国政府严厉打击国际贩毒组织，对于毒品犯罪零容忍；还是《战狼2》《空天猎》中，中国政府多次与联合国以及救助国政府进行沟通协商，尽最大努力解救他国受困人民；亦或是《红海行动》中，蛟龙突击队在顺利完成撤侨和解救人质的任务后，主动履行国际职责，继续追捕“叛乱恐怖分子”，

最终解决危害全球安全的“脏弹”危机……这些情节充分展示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正义性、正当性和大国应有的行为准则及责任担当。与此同时，还有效地回应了西方有关“中国威胁论”的误解和偏见。

结语

随着国内GDP增速逐渐放缓，中国电影市场依旧连创新高，电影产业成为促进消费、拉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电影产业也发生了较大的变革，口碑效应对电影票房的影响越来越大，豆瓣、时光网等网络评分与电影票房关联日益紧密并呈现出“正相关”性。以《战狼2》《红海行动》为代表的军事电影凭借良好口碑在前期排片不理想的情况下实现了票房的稳步攀升和逆袭，这足以证明，在日趋成熟规范产业环境下，良币驱逐劣币已成大势所趋。

当代军事电影借助时代机遇，以品质赢得了口碑和市场。与此同时，产业和市场也对军事电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军事电影如何进一步在题材、类型上突破创新；如何以人性化的视点完成现实表达；如何在合理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同时，避免自娱自乐式的狂欢，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类型品牌……这些都是仍需完善的重要课题。

(赵博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430073)

新主流军事电影的类型惯例与文化逻辑^{*}

Genre Convention and Cultural Logic of New Mainstream Military Film

文 齐伟 /Text/Qi Wei

提要：军事电影是中国电影最重要的类型之一，经典的军事电影不胜枚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电影观众。近年来，《战狼》系列、《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一批新主流军事电影，突破了传统“主旋律”电影以“革命历史”为题材资源的创制模式，在商业运作和主流价值伸张的双重规训下，建构了新的类型惯例。同时，它们又参与了新时代语境“中国故事”及其相关价值和理想的讲述，进而生产并维持着大国崛起时代的“中国梦”。

关键词：新主流军事电影 新时代 讲好中国故事

引言

“广义而言，凡与战争、军队以及军人有关的电影都可以称为军事题材电影或军事电影。”⁽¹⁾ 因为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亲缘关系，军事电影一直都是中国电影最重要的类型之一。在当代中国电影史中，经

典的军事电影不胜枚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电

^{*} 本文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课题“‘互联网+’语境下电影社会舆情分析及判断”(项目编号：GDT1604)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上海大学电影学高峰学科资助。

(1) 饶曙光《军事题材电影与主流大片》，《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5页。